

# 从达拉斯城战役看查士丁尼时代 拜占庭帝国的军事特点

马 锋,徐家玲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萨珊波斯帝国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是早期拜占庭面临的重大外交问题。达拉斯城战役是查士丁尼积极谋划的全局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对波斯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其辉煌军事成就的序幕。它为拜占庭军队的西征准备了条件,也展现了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军事的特点。

**关键词:**拜占庭帝国;达拉斯城;贝利撒留;查士丁尼;萨珊波斯帝国

**中图分类号:**K5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5-0168-06

公元530年的达拉斯城(Daras 或者 Dara)战役是查士丁尼(Justinian the Great, 527—565)时代拜占庭对波斯战争的转折点。这次战役改变了此前拜占庭帝国败多胜少的情况,其斗争过程受到当代和后世拜占庭史家的注意。普罗柯比(Procopius)的《战史》(History of the Wars)<sup>[1]</sup>对这一战役的情况有详细的记载。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的《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sup>[2]</sup>和忏悔者塞奥菲尼斯(Theophanes Confessor)的《忏悔者塞奥菲尼斯的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sup>[3]</sup>在其基础上也有所补充。另外普罗柯比的《论建筑》(On Buildings)一书详细记载了达拉斯城的建造和修葺过程<sup>[4]</sup>。但是后人在研究查士丁尼时代的军事问题时多是注意拜占庭军队的西征,很少关注达拉斯城战役。国外研究拜占庭历史的学者仅仅在叙述查士丁尼时代辉煌成就时一笔带过。<sup>①</sup>有些研究军事史的专家在谈及拜占庭帝国的经典战例时对这一战役有所论述,但是也多限于研究战役的过程<sup>[5][37-39]</sup>。而国内除了一些译著外<sup>[5][6]</sup>,专门研究达拉斯城战役的成果尚无,仅仅有一些关于军事历史的介绍<sup>[7][8][9]</sup>。这种研究现状与达拉斯城战役在查士丁尼时代全局战略上的地位远不相称。本文拟从达拉斯城战役所反映的拜占庭帝国时代军事特点的角度进行研究。

## 一、达拉斯城的战略地位与建城

作为雄踞近东的两大军事强国,罗马——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经常发生战争冲突。在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从高加索地区绵延到阿拉伯地区的边防线,长期面临着萨珊波斯帝国边境扩张的威胁<sup>[10]</sup><sup>4</sup>。两大帝国在边境的各个地段都时有冲突。两河流域和亚美尼亚地区最为集中。两河流

<sup>①</sup> Jonathan Shepar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35; A. D. Lee, War in Late Antiquity: A Social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p.127; James Allan Evans, The Emperor Justinian and the Byzantine Empire,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5, p.58; Michael Whitby, Rome at War AD 293-696,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02, p.53.

域平原广袤,相对于南方阿拉伯的沙漠地区和北方高加索的山地更容易成为军队入侵的路径。达拉斯城位于亚美尼亚与两河流域接壤地区的中间地带,从建城以来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拜占庭军队司令部的驻地<sup>[1]203</sup>。拜占庭军队依据达拉斯城攻守兼备。防御时,它是阻挡波斯入侵的第一道屏障的核心。波斯军队一旦越过达拉斯城就可以长驱直入进犯富饶的亚美尼亚腹地。进攻时,拜占庭军队以此为基地横穿两河流域,直逼波斯都城泰西封(Ctesiphon)<sup>[1]411-431</sup>。拜占庭帝国通过达拉斯城还可以影响底格里斯河上游丝绸贸易中心城市尼西比斯(Nisibis)和幼发拉底河上游左岸丝绸贸易中心城市卡利尼库姆(Callinicum)。因此,达拉斯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达拉斯城建城后,几乎每一次的拜占庭——波斯战争都与达拉斯城有关。

达拉斯城是在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 491-518)时期修建的,到查士丁尼时期得到进一步加固。502—506年拜占庭军队在亚美尼亚地区败于波斯人,使拜占庭将领们深刻反省,体会到军队在重要的边境地区必须建立可靠的基地。因此,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于507年乘波斯人与匈人交战无暇他顾之机,决定在波斯边境重镇尼西比斯城对面18公里处的拜占庭边境上修建达拉斯要塞<sup>[3]231</sup>。由于先前拜占庭与波斯签订的协议禁止双方在边界附近建造任何要塞,所以波斯人据此尽可能地阻止建城。拜占庭人建造匆忙,急于想在波斯人与匈人的战争结束之前完工,导致这座要塞设施后来大部分坍塌<sup>[4]99-101</sup>。到了查士丁尼时代,帝国大力加强边境防御。在拜占庭与波斯的边界部分,查士丁尼采取因地制宜的防御方式。在波斯边境的南段,帝国依靠阿拉伯盟友进行防御,在北段,查士丁尼花费巨额资金来改善城市的防御<sup>[11]55-56</sup>,下令修葺达拉斯城。经过修整的达拉斯城有两道城墙。内墙高大壮观,每座塔楼高达100呎,城墙的其余部分有60呎高。外墙较小,但是也十分坚固。两道城墙之间相距50呎。每当有敌人进攻的时候,达拉斯城的市民和郊区的农民常常把他们的畜群和财产置于内外墙之间,以求保护<sup>[1]377</sup>。达拉斯城从内到外有卫城、内城墙、外城墙和护城河四道防御。工程师设法使流经城市附近的科尔德斯(Cordes)河改道,一方面能够为城市提供淡水,另一方面又通过抬高河床积蓄河水成为城市外围的屏障<sup>[11]56[12]31-37</sup>。达拉斯城是拜占庭军事工程的杰作,经历了长期战争的考验。直到573—574年,这座城市才因波斯人围困而陷落。但是在590年波斯新国王库思老二世(Khosrau II, 590—628)出于感谢拜占庭帝国支持其登位的原因把达拉斯城归还给拜占庭帝国。此后不久,在604—605年库思老二世借口为恩主莫里斯皇帝(Maurice, 582—602)复仇再次入侵拜占庭,经过长达9个月的围攻再次夺取该城。该城直到希拉克略皇帝(Heraclius, 610—641)在位时才得以收复,但是最终在639年被阿拉伯人占领<sup>[13]</sup>。

## 二、达拉斯城战役及其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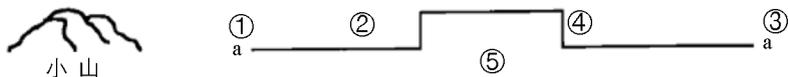
达拉斯城战役是527—531年波斯与拜占庭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战争源于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宗教因素导致的冲突。随着两大帝国对周边民族影响的加强,宗教成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sup>[14]</sup>,成为获得属国向心力的保证。普罗柯比谈到,波斯国王卡瓦德一世(Kavad I, 488—497, 499—531)利用查士丁尼登基未稳之时,借口波斯控制的伊庇里亚人(Iberian)投靠拜占庭帝国发动了对高加索地区的战争。伊庇里亚人本是波斯的基督教臣民,因为无法忍受波斯人强迫其使用琐罗亚斯德教的礼仪转而投靠拜占庭帝国<sup>[1]97</sup>。但是忏悔者塞奥菲尼斯则记载,是由于高加索地区皈依基督教的拉齐卡(Lazika或Lazi)王国与拜占庭帝国的结盟触怒了卡瓦德一世,拜占庭帝国依据盟约出兵帮助拉齐卡抵抗波斯入侵<sup>[3]266</sup>。此前拉齐卡国王无法忍受波斯的政治和宗教压迫,向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一世(Justin I, 518—527)寻求庇护。他在信中谈到,“我们希望您能够使成为像你们一样的基督徒,然后将臣服于罗马帝国”<sup>[15]</sup>。约翰·马拉拉斯对战争起因的记载与后者相同<sup>[2]246</sup>。第二,是对亚美尼亚的争夺。两国都觊觎该地的战略地位和经济资源。对于拜占庭而言,亚美尼亚是其优秀兵源的主要输出地之一,绝不允许波斯实现对该地的完全控制。

经过长期的争夺,作为缓冲地带的亚美尼亚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sup>[16]</sup>第三,还有防御共同敌人产生的纠纷。位于亚速海和黑海周围的匈人要想入侵高加索山区以南的波斯和拜占庭领土,就必须通过一个被称为卡斯皮亚门(Caspian Gates)的山口。波斯人控制了卡斯皮亚门后,一直阻挡着匈人的扩张。因此,波斯国王认为波斯人是帮助拜占庭帝国抵御了匈人的侵扰,要求拜占庭帝国分担防守的费用。<sup>[1]141-145</sup>这遭到拜占庭皇帝的拒绝。第四,最重要的是地缘关系的原因。这两个积极扩张的军事强国必然会发生战争冲突。<sup>[7]159-160[8]60</sup>萨珊波斯宣称其继承的疆域囊括部分拜占庭领土。

在高加索地区爆发的战争很快扩大化。在南部,波斯人联合撒拉逊人(Saracen)侵入拜占庭领土;在叙利亚地区,波斯与此时在拜占庭帝国内部叛乱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Samaritan)取得联系;<sup>[3]270-271</sup>而波斯军队的主力则进攻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地区,达拉斯城首当其冲。忏悔者塞奥菲尼斯谈到达拉斯城战役发生在查士丁尼在位的第3年,即529年,这次战役从6月8日开始,历时3天。战前,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派使节与波斯人谈判,使节滞留在达拉斯城。此时,波斯国王卡瓦德一世派米尔腊尼斯(Mirranes 或 Meram)和王子领兵从尼西比斯城进军达拉斯城。<sup>[3]274-275</sup>拜占庭帝国进行了充分的备战。此前查士丁尼已经派出大批将领加强东方战线的防御力量。<sup>[2]256</sup>拜占庭军队依旧再次败北,这引起查士丁尼的愤怒。他继续增加东方战线的兵力,并任命贝利撒留(Belisarius)为东方战线的统帅。<sup>[2]260[1]103-105</sup>贝利撒留在迅速赶往达拉斯城途中联络军队各部。在波斯人到达达拉斯城之前,贝利撒留已经集结了2万军队严阵以待。

贝利撒留并没有依据坚固的城池消极防御,而是积极进行战前部署。贝利撒留命令部队在城外挖掘了一条奇怪的战壕(如下图)。这道战壕不是挖成一道直线,而是挖成下图的样子。战壕的中间部分并不长,而且是直的,但在它的两端各挖一道与之形成直角的沟;而在这两道直角沟的尽头处,各自再挖两道与中间部分平行的战壕。<sup>[1]105</sup>贝利撒留根据拜占庭军队的不同特点进行了布置:左翼边缘的防线靠近小山,由布吉斯(Bouzes)率领的大队骑兵和法腊斯(Pharas)麾下的300名埃茹利人(Erulian)士兵据守;在其右边直到直角处的防线由玛撒该塔伊人(Massagetae)苏尼卡斯(Sunicas)和阿伊干(Aigan)统辖600名骑兵据守。这样布置的目的是:如果布吉斯和法腊斯的队伍无法抵御敌人的攻击,后者可以从侧翼绕到敌人的后方支援罗马人(这里指拜占庭军队);右翼的部署也类似。右翼顶端驻守的大队骑兵由约翰(John)等人统领。而右翼直角处则是玛撒该塔伊人西玛斯(Simmas)和阿斯坎(Ascan)统率下的600名骑兵。他们同样担负着利用时机包抄敌后的任务。<sup>[1]107-109</sup>比较薄弱的步兵被部署在战壕的中央部分。守卫战壕的部队能够得到城头守军的“火力”保护。

① 罗马军队的战阵如图所示:



①布吉斯与法腊斯。②苏尼卡斯与阿伊干。③约翰、库里尔、马尔凯路斯、日耳曼努斯和多若提乌斯。④西玛斯与阿斯坎。⑤贝利撒里乌斯与海尔莫盖尼斯。a— a为沟。

选自[拜占庭]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4页。

波斯人的总兵力有4万人,包括精锐的不死军团。而约翰·马拉拉斯则认为波斯军队有7万人。<sup>[2]265</sup>波斯人对拜占庭的阵线感到惊讶,不敢贸然进攻,而拜占庭军队则静静地守在战壕后面。这种静默状态一直持续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波斯人的右翼骑兵分队进行了进攻尝试,但是很快被抵挡回去。双方又回到先前的静默状态。其间出现了单兵决斗的情况。整个6月8日这一天双方都在观察试探对手。到了第2天波斯人得到1万名后续援兵,决定发动总攻。战前双方的指挥官表面上很友好地下战书。贝利撒留给波斯统帅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争取和平避免战争的观念。

他在信中谈到，首要的幸福是和平，所有稍稍有一点理智的人都同意这个说法。因此如果有谁破坏和平，那么这个引起麻烦的人不仅要对他身边的那些人负责，而且要对他的整个民族负责。因此最优秀的将领乃是能把战争化为和平的人。<sup>[1]113</sup>但是双方将领都明白对方不会退让。到了第3天日出时分，两方指挥官都进行了战争动员。波斯将领米尔腊尼斯指出：“在此之前罗马人一直是习惯于在混乱无秩序的状态下开战，但近来他们却列阵有秩序地迎战进攻的波斯人，而这种情况又绝不是他们的特点。”<sup>[1]117</sup>波斯全军官兵都认为拜占庭军队不堪一击。贝利撒留针对拜占庭士兵畏惧波斯人的情况指出：“既然在先前的战斗中我们已经摸清了波斯人的底细，因此你们肯定知道，他们根本不是不可战胜的，而且不是强大到不能被杀死的程度。”<sup>[1]119</sup>

中午时分两军开始了厮杀。米尔腊尼斯把波斯军队排列成左中右三个方阵，步兵方阵组成中央部分，主力骑兵分别配置在两翼。波斯军队避开拜占庭军队的中央部位，集中力量向两翼进攻。然而这种谨慎的措施，却正好中了贝利撒留的圈套。因为贝利撒留的骑兵都配置在两翼。拜占庭骑兵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能够与波斯骑兵匹敌，是其制胜的关键。波斯右翼骑兵首先攻击拜占庭军队的左翼，最初进展顺利。此时埋伏在小山背后的埃茹利人骑兵突袭敌人后方，对波斯军队的侧翼进行包抄。<sup>[17]</sup>同时匈人轻骑兵攻击这支波斯骑兵的另一侧翼。波斯右翼骑兵很快退出了战场。而在拜占庭军队的右翼，波斯左翼骑兵方阵进展迅速，攻击到城墙脚下。贝利撒留发现波斯左翼骑兵与中央步兵方阵之间出现了空隙，立即把所有的骑兵都投掷在这个空隙中。缺乏步兵保护的波斯左翼骑兵受到城墙守军和拜占庭骑兵部队的夹击，很快失去了战斗力。由于两个侧翼都被围困，波斯的中央步兵方阵暴露在拜占庭骑兵的攻击范围之内。在结束两翼战斗后，贝利撒留把所有骑兵都用来攻击波斯的中央步兵方阵的侧翼，战壕中的拜占庭步兵则从正面进行攻击。拜占庭军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贝利撒留认为穷寇莫追，胜利收兵。

达拉斯城战役是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全局大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查士丁尼的战略是先集中兵力战胜波斯人，解除后顾之忧后再在西方进行各个击破。查士丁尼为了安排这场与波斯人的决战，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加强了对波斯——拜占庭边境及其腹地的控制。查士丁尼创建了亚美尼亚野战军团，平定了叙利亚地区的叛乱，镇压东方异教徒和异端信仰。<sup>[3]269-274[2]260-262</sup>拜占庭军队通过达拉斯城战役扭转了颓势。亚美尼亚野战军团与原来的东方野战军团相配合，使波斯人连遭败绩。波斯人在532年同意缔结“永久和平”协议。根据协议内容，查士丁尼支付一笔巨额赔款给波斯，以分担波斯军队防御匈人的费用。但是他却通过减少东方战线军队的驻军和停发东部边境卫戍部队军饷的方式使国家财库不至于压力太大。<sup>[18]</sup>从全局的角度看，达拉斯城战役的胜利为拜占庭军队西征准备了条件。不久，在534年，贝利撒留挥师西进，开启了查士丁尼时代的“西征”伟业。因此可以说，达拉斯城战役是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与波斯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查士丁尼时代辉煌军事成就的序幕。

### 三、达拉斯城战役展现的拜占庭帝国军事特点

达拉斯城战役是贝利撒留指挥的第一次大规模会战，成为此后他率军进行西征的典范。达拉斯城战役展现了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军事的基本特点。总体而言，有如下几点：

第一，拜占庭军队的主体是蛮族雇佣军。在达拉斯城战役中，玛撒该塔伊人和埃茹利人组成的重骑兵和轻骑兵成为了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拜占庭军队中有大量蛮族人的情况在《战史》中随处可见。在一次贝利萨留接见波斯使节的事件中，普罗柯比记载了军队中有色雷斯人(Thracian)、伊利里亚人(Illyrian)、哥特人(Goth)、埃茹利人、汪达尔人(Vandal)和摩尔人(Moor)。<sup>[1]441</sup>在534年远征汪达尔人时，查士丁尼为出征迦太基(Carthage)准备了10 000名步兵和5 000名骑兵，这部分士兵是从正规军和“联盟者”(Feederati)当中征集来的。这些联盟者包括玛撒该塔伊人、埃茹利人、

奇利奇亚人(Cilician)。贝利萨留自己就是一名日耳曼尼亚人。<sup>[19]103-107</sup>

第二,拜占庭军队突出将才的作用。蛮族和罗马人在军队中各自保留了自己的战斗特点。蛮族人多有强健的体魄,罗马人着重于纪律严明和坚忍不拔。蛮族军人在帝国的旗帜之下服务,能把双方的优点结合起来。他们的蛮力发挥的效果,要依靠优秀指挥者的指挥。<sup>[20]</sup>如果说罗马帝国的胜利是由于军队的纪律和操练,那么拜占庭帝国的胜利则是由于战略战术和将才。帝国雇佣蛮族人充当轻骑兵或者重骑兵。作为马背上的民族,这些蛮族军人具有优越的骑兵作战条件和天赋。拜占庭将军在战斗中十分注意发挥各个民族自身的战术特点。<sup>[10]11</sup>在达拉斯城战役中,贝利萨留的军事才华体现在军队集结、构筑防御、战争动员、军队列阵、发挥多民族军队特点和把握战局变化等多个方面。

第三,拜占庭军队战术特点体现了野战军和边防军的有效配合。从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时代起,罗马军队出现了野战军和边防军的区分。拜占庭帝国军队沿袭这种分野,使之与军事战略适应。边防军沿着边界驻扎在堡垒中,对抗低烈度的敌人侵扰,或者削弱敌人大部队的进攻锐气,为野战部队的围歼争取时间。野战军驻扎在有军事交通线的城镇,能快速地对入侵之敌形成包围,歼灭敌人或者迫使敌人撤退。野战军分为三种:普通野战军、将领私兵和宫廷卫队。在达拉斯城战役中参战的主要是边防军(达拉斯城的卫戍部队)和野战军(调遣的部队)中的前两者。将领私兵在此战中表现突出。在第一天的单兵决斗中,将领布吉斯的一名私兵接连杀死了两名波斯挑战者,鼓舞了拜占庭军队的士气。

第四,拜占庭军队重视战略的运用和突出骑兵的战术作用。贝利萨留为完善拜占庭军事制度做出了两个贡献:一是推行攻势防御战略,二是凸显骑兵在战斗中的主导作用。攻势防御战略仅限于查士丁尼时代使用。一方面在查士丁尼时代,军队动乱处于低谷。<sup>[21]</sup>先前的军事和财政改革为军事行动提供了军事和物资保障。<sup>[22]</sup>查士丁尼以此发动了收复地中海失地的西征。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帝国面临各个方面的军事威胁,无法为军事行动提供太多的兵力。在达拉斯城战役中,拜占庭与波斯军队之比是2:5。出征北非的拜占庭军队也仅有1万5千人。<sup>[19]103</sup>而汪达尔人有8万军队。<sup>[19]53</sup>贝利萨留成功地使用了攻势防御战略,完成了艰巨任务。在达拉斯城战役中,贝利萨留面对敌众我寡的局面并没有采取消极防御。他把军队开出城外与波斯人对阵,引诱敌方先发动进攻。凭借对地形的合理利用和军队的有效配置,使拜占庭军队在战斗中并没有表现出人数上的劣势。在战斗中,拜占庭军队采取攻势态势,充分发挥了骑兵的主导作用。出动骑兵部队把波斯军队分割包围,集中兵力逐一歼灭。

第五,拜占庭军队重视城镇和军事工程的使用。中古时代,骑兵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导力量。因此,防御者修筑战壕和城墙就成为抗击骑兵冲击的必然选择。贝利撒留在达拉斯城战役中充分发挥了二者的作用。首先,是最大化地发挥达拉斯城的优势。达拉斯城建立在三座小山之上,易守难攻。这种选址方式体现了拜占庭修建军事城镇的原则。拜占庭帝国具有成熟的建城理论体系。建城首先是出于军事需要,而不是商业需要,其次才是城市的一般功能的设置。<sup>[11]37[12]31-37</sup>在此战中,达拉斯城既发挥了军事基地的作用,又使守军能利用城墙对波斯骑兵构成杀伤力。其次,拜占庭军队挖掘的战壕有效迟滞了波斯骑兵的攻击。利用战壕防御是这一时期防御战的习惯战术,在埃弗撒利塔伊人(Ephthalitae)防御波斯人的战斗中也有运用。<sup>[1]23-27</sup>

第六,拜占庭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和平。在决战前,贝利萨留在给波斯统帅的信中表达了争取和平避免战争的观念。获胜后,贝利萨留命令军队勿追逃兵。这是因为拜占庭军队战斗目的是抵御侵略以求和平,而非消灭敌人。拜占庭帝国由于地理特点受到多方面的军事威胁,但缺乏充足的兵源。所以拜占庭人知道和平是暂时的,因此在冲突的消耗中即使失去极少数量的士兵都是极大的损失。拜占庭拒绝旧罗马军队进行最大消耗的做法,强调对士兵的保护。无论在何时只

要可能,拜占庭都极力避免前沿攻击和冲突造成的高昂伤亡,依靠策略赢取战争而不是毁灭敌人。<sup>[10]58</sup>这种以战求和的策略是拜占庭帝国延续的国策。

#### 参考文献:

- [1]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M]. Vol I, trans. by H. B. Dewing,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 John Malalas. 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M]. trans. by Elizabeth Jeffreys et. al., Melbourn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Department of Modern Greek, 1986.
- [3] Theophanes Confessor.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M]. trans. by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 [4] Procopius. On Buildings[M]. trans. by H. B. Dewing,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5] (英)李德·哈特. 战略论[M]. 钮先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6] (拜占庭)普洛科皮乌斯. 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M]. 王以铸,崔妙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7] 吴春秋. 世界战争通鉴[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
- [8]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 军事历史 I[M]//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 [9] 祁长松,谭京生,李雄. 外国古代战例选[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 [10] Edward N.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1] James Allan Evans. The Emperor Justinian and the Byzantine Empire[M]. Westpor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5.
- [12] George T. Dennis translation and notes. 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M].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1985.
- [13] Theophanes, the Confessor.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M]. trans. by Harry Turtledov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2: 40.
- [14] 徐家玲. 拜占庭文明[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0-72.
- [15] Dimitri Obolensky. Byzantium and the Slavs[M]. New York: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94: 17.
- [16] David Nicolle. Romano-Byzantine Armies 4th-9th Centuries[M]. Oxford & New York: Osprey Publishing Ltd, 1992: 33-35.
- [17] Maurice. Maurice's Strategikon[M]. trans. by George T. Denni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4: 15.
- [18] Warren Treadgold. Byzantine and Its Army, 284-1081[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
- [19]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M]. Vol II, trans. by H. B. Dewing,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0] (英)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卷[M]. 席代岳,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108.
- [21] Walter Emil Kaegi Jr. Byzantine Military Unrest 471-843[M]. Amsterdam & Las Palmas: Adolf M. Hakkert, 1981: 41.
- [22] 马锋. 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时代的军事变革[J]. 古代文明,2012(4):10-15.

责任编辑 张颖超